

〔清〕徐鉉 主修 〔清〕蕭琯 纂修 龙云清 校注



松桃厅志



校注本

贵州民族出版社

松桃厅志

校注本

〔清〕徐鉉 主修

〔清〕萧瑄 纂修

龙云清 校注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松桃厅志 (校注本) / (清) 徐鉉主修; (清) 萧瑄纂修; 龙云清校注.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412-1352-7

I. 松... II. ①徐... ②萧... ③龙... III. 松桃苗族自治县 - 地方志 - 清代 IV. K29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0622 号

松桃厅志 (校注本)

[清]徐鉉 主修 萧瑄 纂修
龙云清 校注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50 千字

开本: 1000 × 1400mm 1/32

印张: 12.375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2000 册

书号: ISBN 7 - 5412 - 1352 - 7/K · 137

定价: 48.00 元

ISBN 7-5412-1352-7



9 787541 213526 >

松桃廳志 ■ 校注本

松桃廳者黔與楚蜀之隙
地而赤苗出沒之隩區也
其地華離嶮岨箐密洞深
其人蟻伏鶉居獷悍剽疾

《松桃厅志》校注本编委会

顾问

龙长春 龙海 麻绍平 张其富 贺从宪

主任

戴启来

副主任

龙新林 姚元忠 龙险峰 田儒凤 石宏忠

张琪敏 成朝俊

委员

谢廷扬 唐其先 宋真道 龙永才 任廷瑶

田晓军 戴启晓 孙晓 龙先辉 麻光忠

龙云清

主持单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松桃厅志》校注本序

龙 海

《松桃厅志》编撰于道光十五年(1835),是松桃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地方志书。它记载了松桃170年以前的历史,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了让这部历史文献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让更多的人了解松桃,研究松桃,并为各级领导决策施政提供有效的参考,我们把它点校出来,便于大家批判地继承。

前人步武的终极,应该是后继者发轫的起点。由于这部《松桃厅志》记事距今较远,并且从它成书以后,直至1996年《松桃苗族自治县志》出版之前,其间没有第二部《松桃厅志》或《松桃县志》。170年的历史跨度给我们对这部《松桃厅志》的阅读带来了不少的障碍。松桃苗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龙云清同志经过艰苦认真的工作,终于把它校注了出来,许多脱、讹、倒、衍之处也得到了订正,实在是值得高兴的一件大好事。

这部《松桃厅志》诞生于道光年间,由于编修者的阶级立场和时代局限,书中的许多观点与我们现在的认识不尽一致,尤其是对苗族和苗民起义有许多措词带有浓厚的歧视色彩。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他们能给我们留下这笔文化遗产,为我们记录和储存大量的历史信息,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如果没有他们的辛苦和责任,没有他们记下这些信息,我们便无法对松桃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追溯,也无法对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苦难进行深度的研究,更无从谈上了解历史的是非功过。

松桃是一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人民有着高贵的性格。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潜在能量。在阅读这部《松桃厅志》的时候,我时常在想,细腻的情感滋养了松桃人敏锐的感官,刚烈的性格培育了松桃人大无畏的精神。170年前,杨芳在关中平原单骑冲入敌营,收降两千叛军;50年前,龙世昌在朝鲜战场视死如归用胸膛抵着爆破筒把敌人的碉堡炸掉。这样的胆气,这样的举止,正是这片土地养育的结果。

有人说,文化没有遗传性,但是当文化融进血液之后,血液便无法清洗;当文化融进了土地的时候,便很难再把他分解出来。松桃的文化,融进了松桃人的血液,也化入了松桃的土地。使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共同具有了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性格。从坡东到坡西,从山川到人文,处处都在洋溢着无法掩

蔽的生机。生活在这片充满进取和拼搏的土地上,我们时常感觉到豪情满怀,内心里永远都充满着无穷的幻想。

170年前,贵州提刑按察使杨殿邦给本志作序时说,松桃只要“化犷悍剽疾之俗为刚武强健之才”,那么“千人之杰,万人之英,且接迹踵生”。我很欣赏杨殿邦这个观点,因为事实上松桃自道光朝以来,确实人才辈出,军界、政界、文化界,都先后涌现了许多志存高远且令人瞩目的人物。从清代的杨芳、石柳邓、欧阳华坤到近现代的欧百川、吴峻仁、吴向必、龙世昌等等,无不是松桃这片土地的精英。

《松桃厅志》除了为我们记录大量的历史信息之外,同时还是一本文字脱俗、叙事流畅、要言不烦的好书,每一节、每一段、每一句,都可读可诵,丰泽润亮,也充分体现了古人惜墨如金的文风。但愿此书的再版,能够对我们鉴古观今,开创未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6年2月20日

校注本前言

一、关于松桃直隶厅

“厅”是清代创设的行政区划。它原本是知府的佐贰官同知、通判的办事处所,由于清朝的同知、通判多数是分派于各地方专管某一地区,因此逐渐与辅佐知府之同知、通判区别开来,形成一级行政单位。厅的行政长官是同知或通判。凡直属于布政使司管辖的厅为直隶厅,其制与府、直隶州同;属于府管辖的为一般散厅,其制与县同。嘉庆二年以前,松桃厅隶属铜仁府,相当于县;嘉庆二年以后升为直隶厅,相当于府。

松桃直隶厅的区域,明永乐年间为乌罗府,辖有乌罗、答意、治古、平头著可四长官司和朗溪蛮夷长官司。宣德五年(1430),答意、治古二长官司石各野等与竿子坪长官吴毕朗举兵反抗,招抚不从,前后凡八年。正统三年五月,因乱后“残民无儿”,朝廷令将答意、治古二长官司永行革除,乌罗惟存三司,不足以立府,遂将乌罗府革废,以乌罗、平头著可二司隶铜仁府,以朗溪司隶思南府。

康熙四十三年(1704)八月,境内苗民起义失败后,铜仁府添设“理苗同知”一员,分驻正大营。雍正五年(1727)三月,兵部议复升任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言:“黔、楚交界之生苗,久居化外,今铜仁府所属坡东、坡西向化归诚者一百五十一寨,均宜设协安营,移兵驻扎。”于是令铜仁协添兵八百、镇远营添兵一百,分防松桃等处。雍正八年(1730),又令将铜仁府原驻正大营理苗同知改驻长冲老松桃,置松桃厅,仍隶铜仁府管辖;于正大营设巡检一员专理苗务。雍正十一年(1733),移松桃于蓼皋,建松桃城。乾隆六十年(1795),在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下,暴发了著名的乾嘉苗民起义。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清王朝慑于苗族人民的反抗力量,于嘉庆二年(1797)十一月,将松桃厅升为直隶军民厅,由省派员分驻;将铜仁协拨转铜仁,另设松桃协,隶于古州兵备道兼分巡贵西道。同时,以铜仁府属之乌罗、平头二长官司及其副司划隶松桃直隶厅。

松桃直隶厅为苗疆“要缺”。按清代官制,铨选职官,首先把各种官职定为“缺”,无论正印、佐贰或杂职,均列为“员缺”。关于员缺的补授,清代有许多具体而复杂的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按各府、厅、州、县所处的地理位置、管辖面积、重要程度、贫富情况等条件,将其划分等第,以“冲、繁、疲、难”四字标之,四字者为“最要缺”,三字者为“要缺”,一、二字者为“中缺”和“简缺”。松桃

直隶厅原本是由铜仁府分出,管辖有坡东八汛、坡西六汛和乌罗、平头等四个长官司。铜仁府为“繁、难”中缺,松桃直隶厅为“繁、疲、难”要缺。要缺职官,三年俸满,有政绩而无差错者,例即升用。

今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划总体上是沿袭原松桃直隶厅的疆域,但存在一定的出入。有的地方当年属厅管辖,现在调整到其他省、地、县;有的当年属其他府、厅、县管辖,现在属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管辖。如普觉和寨英的部分地域,原属镇远府;沙坝乡一带原属安化县;九江乡一带原属四川省秀山县;牛郎镇一带原属铜仁府,现在皆属松桃苗族自治县管辖。而当年的六曲、贵外、督陀、豆麻、卜居、宽坪、大堡、龙眉、江口、凯牌等里,原系厅属,现在分别划归思南、石阡、德江、江口、沿河、镇远、岑巩等县管辖。以前的司、卫、汛、堡、里所辖疆域与现在的乡镇区划也很难一一对应。如现在的太平乡红岩村,共分为大院子、小院子、大田坝、岩脚、朗溪司、吴家、伙矢坳、刘家、鲤鱼塘、吴家桥、肖家湾、干河等十二个自然寨。但是道光时期,朗溪司、吴家寨,属于平头司大桥里民村;鲤鱼塘,属于坝带里民村;吴家桥、岩寨寨、干河、大院子属于大平汛;肖家、刘家、大田坝、小院子、伙矢坳等,则尚未形成村落。

二、《松桃厅志》产生的时代背景

《松桃厅志》诞生的年代,正是中国方志学兴盛的一个重要时期。清政府为了编修《大清一统志》的需要,先后多次下诏各省按照统一的体例,编修《通志》。各省又发檄文给府、厅、州、县,要求各府、厅、州、县编修志书。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中央王朝下发给各省的诏令以及各省发给府、厅、州、县的修志檄文不下数十次,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修志高潮。这股潮流的持续时间之长和成书之多,在中国古代方志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段时期,全国共约修成省、府、厅、州、县志共计 3201 种,《松桃厅志》便是其中之一。

清代兴起修志高潮,并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封建帝王高度重视;二是大批学者竭诚参与。

(一)封建帝王高度重视

崇尚大一统历来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心理特征。同样,颂扬和体现大一统,也是中华儿女难以割舍的情怀。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有各种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志书问世。如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等等。到了元明时期,出现了《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等直接以“一统”命名的志书。满清入主中原后,维护和发展中华大一统自然也成了清朝政府的历史责任。同时,编纂《一统志》和各地的方志,也正是清朝政府维持对全国各地的有效统治,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重要举措和手段,也为反映清朝

的大一统状况和清政府的功绩提供了一个重要载体。

康熙十一年,保和殿大学士周祚上疏:“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然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抚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各直省、府、厅、州、县修辑志书,全国的修志高潮从此逐步掀起。在编修《一统志》的过程中,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历代帝王都一直非常重视,经常过问修志的一些具体事宜,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要求,下诏催促各直省抓紧办理。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六载,康熙帝曾嘱咐《一统志》的纂修官说:“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阨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万几之余,朕将亲览。”《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七十五载,雍正帝曾下旨要求“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并将方志编纂工作作为吏部年终评议地方官政绩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或至有如李绂之徇情率意者,亦即从重处分。”

皇帝的重视,使修志工作成了全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成了各个地方文化史上的大事。因此,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均得到高度重视和支持,加之志书是一个地方的史书,编修地方志,多数是地方长官为主修,聘请有实力的学者为纂修。资料的选择、内容的裁定,一般皆由地方官主决,在政策方针的把握上较为审慎,对修志高潮的兴起和持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大批学者竭诚参与

《周礼》说:“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清朝前期,由于受到文字狱的影响,思想受到禁锢,许多文化领域人们不敢去涉足,于是一部分学者皓首穷经,对文字、音韵、训诂等进行深入的揣摩,带动了“汉学”的兴起;一部分学者把修志当著述大业,积极投身到各地的修志活动中,对各个地方的山川、风物、人文掌故等进行认真的清理,开了一代修志之盛世。

梁启超在《莱阳县志》卷首《奉上修志敕文》中说:“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如顾炎武参修《邹平县志》、陆陇其纂《灵寿县志》、李文藻纂《历城县志》《诸城县志》、全祖望纂《宁波府志》、钱大昕纂《鄞县志》、孙星衍纂《松江府志》《三水县志》、戴震纂《汾州府志》《汾阳县志》、郑珍和莫友芝纂《遵义府志》、邹汉勋纂《大定府志》《安顺府志》等等,有清一代的著名学者几乎都参与进了修志活动中。同时,风潮形成后,人们对修志和修志

人的认识与看法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某人能否主修或参修志书,不仅是其学识、学术名望的反映,也是他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在朝廷、官府层面上的体现。许多学者少则主修或参修一、二部,多则修上六、七部。如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先后纂有《永清县志》、《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和州志》、《亳州志》等。这些学者中,许多人在史学、经学、地理学、谱牒学、文献学、文学等领域都各有建树,他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将学术研究与修志实践相结合,发凡起例,广罗材料,考证史实,讲求章法,也大大的促进了清代方志编纂水平的提高,吸引了更多的后学不断加入到修志的领域。

《松桃厅志》于道光十四年设局开始搜集资料,十五年完稿,十六年刻印成书。由松桃直隶厅同知徐鉉主修,萧瑄纂修。徐鉉,字慎堂,江苏宜兴县监生出身,对编修《松桃厅志》非常重视,亲自参编和审稿,对所采录的资料也要求翔实可靠,宁缺不滥。故萧瑄《跋》中说:“草创成编,其增削举受裁于慎堂公祖。”萧瑄,思南府安化县人,举人出身,曾任过江西新城县知县,在“才、学、识”几方面都有过人之处。他除了主撰《松桃厅志》以外,还先后纂修了道光《续思南府志》、道光《贵阳府志》等书,其中《贵阳府志》是纪传体志书的典型代表,有纪有传,有录有略,又辅之以图,参之以表,堪称当时全国名志之一。萧瑄的修志才华,在贵州方志编修领域具有很大的知名度,也为全省的志书修编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松桃厅志》的基本特点

志书作为一个地方的官修史书,必须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目的。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说:“夫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松桃厅志》作为一方学术文化的总汇,内容自有其特点,兹就其牵牵大者,述之如下。

(一)资料丰富,记述全面

志书自宋朝以后,开始形成一定的模式。到了明清时期,因为《一统志》采于省志,省志采于府、州、厅、县志。清政府为编修《大清一统志》的需要,强调各省《通志》皆仿《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体例,对各个地方的疆域、沿革、山川、建置、城镇、乡里、物产、财赋、户口、兵事、民情、风俗、人物、艺文、名胜、古迹、异闻、琐事等进行载述。可以说清代的志书体例,基本上是钦定体式。尽管各地记述的区域有广狭之别,任务有繁简程度的不同,但编纂方法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有“博物之书”、“地方百科全书”之誉。

资料是志书的基础,也是衡量志书质量高低的主要尺度。《松桃厅志》共分为天文、地理等三十二卷,包括八门、八纲、六十目,体例上主要是“仿《贵州通

志》之例，以天文、地理、营建、食货、秩官、武备、人物、艺文为纲，每纲下各列条目，以类相从”。既强调各门类的发展演变，更重视对现状的记录。各代职官的题名多止于现任，而名宦则录其去任者。对主修者的政绩，记录尤多。

《松桃厅志》的主要资料一方面是来自地方政府的案牍、文献、信札、笔记以及金石碑刻、谱牒家传、诗文集等资料；二是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测绘得来的资料。徐鉉在《序》中说：“然《志》之难，非难于载笔，而难于采访也；又非采访之难，而难于采访者之不阿私、不徇情，贵实而循名也。”本书不仅在纵向的连续性上对松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相关的人物、事件进行了记述，而且横叙了松桃的自然、社会和人文，对松桃的城池碉堡、官观寺院、名山胜景、良田秀水、潭泉瀑潮、功臣名宦、烈妇贞女、美士嘉媛、地方物产、神话传说等都有所交待和说明。同时，松桃位于三省交界之地，坡东、坡西的大片地域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被称“三不管”。本志《卷六·风俗》载：“康熙九年（1670），副将贺国贤镇守铜郡，开道于石榴坡，松桃附近之地始束版图”。这片新入版图的地域，书里叫做“新疆”。许多事件、人物与凤凰、花垣、秀山、铜仁相关联，不可割裂。即使因体例的限制，不便越境而书，不可能把相关联的问题尽数阐述清楚，但也不可或缺。因此，《松桃厅志》修成后，一方面为我们记录和储存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保存了明清时期许多有关松桃历史和苗族历史的重要文献，成了我们研究松桃历史和苗族历史的重要资料，同时对周边县份的历史研究也具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同时，《松桃厅志》还较为系统地记载了松桃景点的分布，是一本高级的导游书，能让许多读者足不出户而披卷神游，是研究松桃旅游历史的重要资料。

（二）区域性突出

《松桃厅志》是松桃的首部志书，记述松桃史事的范围大体以清代松桃直隶厅所辖疆域为准，是一部区域性著作。《松桃厅志》在对松桃的自然与社会进行反映时，着重记载了人物、诗文、名胜古迹，充分体现了松桃的人文特色和地域特点。有关名胜古迹，记有梵净山、黑坡城、水月庵等以及坡东、坡西各汛堡，几乎包括建置的大部分内容，其中尤以寺观为详，不仅专列了“寺观”部分，同时在形胜、关隘、艺文、记、序等部分中亦有不少描述。人物涉及名宦、乡贤、人物、秩官、选举、烈女、军功、疏、表、墓志等，也占据了相当多的篇幅。

明清时期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我国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以来，在松桃这片地域上，由于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军事活动频繁，往来于松桃的军政人物非常多，对松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康熙至道光，先后到过松桃的督抚有十数人之多，其中如云贵总督福康安、琅玕、富春，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毕沅以及陕甘总督杨遇春等，都是当时

极有分量的重臣;本籍先后涌现的如杨芳、石柳邓等,也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而对于节妇贞女的搜罗和渲染,亦可阐一代之幽光。虽然书中人物分正面与反面,文字处理有褒亦有贬,但是文字上的褒贬并不足以掩蔽人物的光华。

由于战乱频繁,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境内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崇尚体育,大部分村寨,都有武师设堂课徒,武风炽烈,“材武成俗”。历朝以来,武功高手也是人才辈出。如宋代的天龙相公,明代的龙西波、吴黑苗,清代的杨芳、石柳邓、白老寅、欧阳华坤等等都是武艺高超的代表。徐铨在《昭忠祠记》中说:“厅同泽同袍,向称劲旅。”征金川、伐缅甸、讨白莲教以及平定张格尔叛乱,松桃军人的足迹到达了云南、四川、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十多个省区,影响很大。光绪二十年(1894),贵州学政严修在铜仁主持院试时,有“松桃武风名天下”之赞。

诗文著作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一个地方文化发达与否的标志。有关松桃的著述和松桃人的著述很多,《松桃厅志》对此也有充分的反映。对诗文的采用有两种处理办法,一是附于有关山川、学校、古迹、师旅考等内容之下,如学校附有《绅士请设厅学原呈》,关隘附有阿军门的《丰收坡题》诗,师旅考附有《铜楚平苗纪略》、《石岷平苗纪略》等;二是专列章节在诗、记、传、序、表、议、谏、赞、墓志等集中收录。收录的原则是“艺文必有关于地方风土人情者,始敢收入。如仅吟风弄月,概置不登”。大量的诗文,一方面说明了松桃文运渐开;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研究松桃乃至清代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三)体例上繁中寓简,以简核为尚

历代志书,存在尚繁和尚简之分。尚繁者认为古史的最大毛病在于简略,因此追求繁富,主张“事贵详,详则后有考焉”;有的主张简核,认为“备则诬,诬则疑;略则实,实则信”。清代著名方志学大师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也主张志书“要简、要严、要核、要雅”。

《松桃厅志》是时代的产物,自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当时各府、厅、州、县的志书都是为省里编写《通志》而撰述,《通志》又是为了《一统志》而撰述。在体例、科目上,从上到下已有一套现成的规定,任何志书都必须完成上级规定的基本科目,不缺不漏。因此,能充分体现一部志书著述风格的便不是在体例上,而是在体例框架内各科目的记述风格。

由于徐铨、萧瑄都是硕学之辈,不仅属笔吐词皆有独到之处,而且诗文俱擅,有博贯通综之识。他们对松桃风光形胜、史迹人物的介绍,许多地方虽然只是寥寥数语,然而春色染林,一二花枝,依然可见其韶光浩荡,姹紫嫣红。比如对梵净山金顶古寺的描写:“寺在极顶,风峭,不可瓦,冶以铁。千里风烟,可一览而

尽。”对天马寺的描写：“寺在双凤山前，古树槎桠，绿云一片，时有钟声破烟而出”。语言文字风格存在明显的尚简倾向，而又不失其生动活泼，洋洋大观。

贵州提刑按察使杨殿邦在《松桃厅志·序》中对徐铉、萧瑄撰修此志作的评价是：“有《志》如此，岂止加入一等哉！”

《松桃厅志》自刻印成书以来，历 170 余年，未有复刊。这次校注，只能是就书校书，虽然校者得到了许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但是由于水平所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尚望博雅君子批评指正。

2006 年 3 月 12 日

校注凡例

(一)原书系繁体字竖排,杨殿邦《序》为楷书,徐铉《序》为行书,《跋》为隶书。校注本的原书正文部分一律用规范汉字的宋体,大、小标题用魏碑体和黑体。校注者所作的校注和所加附件的正文用楷体,附件的标题用黑体。原书无标点,校注本加标点。

(二)原书中“吾皇”、“圣朝”等抬头比其它文字高出两个字,校注本一律按现行规范编排;原书中的小字号均改与正文同号。

(三)原书目录排在凡例之后,无页码,现加页码并调至杨殿邦《序》之前。卷二的图题、图画、图赞,原位于《舆图》之后,校注本均照原样复制,并移至本卷卷末进行编排。此外,从《铜仁府志》补入“正大营城图”(当时正大营地归松桃厅辖,汛系铜仁协设)。

(四)原书的干支纪年,校注本以()形式加公元纪年。

(五)原书因形近、音同致误的,如“木”、“本”,“己”、“巳”之类出错,校注本据实校改,酌加说明。

(六)原书注释和说明以|表示,疑掉字以〈〉表示。

(七)原书通假字较多,不单独作说明。但某些注释,在解释或说明主要问题时也顺便指出通假字。

(八)人物、官衔、典故等,只对与本书文意相关的内容进行注释,多次出现的,只作一次注释;个别特殊字词也顺便作了语文性注释。

(九)原书征引的文献书名、篇名,有全称、略称或别称、合称等,前后多不一致,校点时均酌加书名号;原书引用文献有误或省改之处,凡不失原意的,只在校注中说明,文本保持原貌不变。

(十)许多地名系汉字记苗语语音,故有同一地名而前后用字不同者,校注本能统一则选取出现次数较多的一个统一之,不能统一者作说明。书中地名,至今未变者不作说明,古今称谓不同者或另有他称者酌加说明。

(十一)原书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及观点上的错误,均保存原貌,不纠驳,请读者明鉴。

(十二)原书中有的“洞”是指山洞、石洞等自然地理现象,有的“洞”是行政机构名称。请读者注意联系上下文辨识。

目录

《松桃厅志》序	(1)
序	(3)
纂修姓氏	(5)
凡例	(7)
卷之一 天文门	
星野	(11)
气候	(14)
祥异	(16)
卷之二 地理门	
舆图	(18)
建置	(18)
卷之三	
疆域	(75)
卷之四	
形胜	(91)
山川	(92)
卷之五	
关隘	(104)
津梁	(106)
邮传	(108)
卷之六	
风俗	(110)
苗蛮	(116)
古迹	(118)